

前言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人民通信兵从缴获的半部无线电台起家,在战火中迅速成长壮大,成为我军一支重要的作战力量。红色电波传递党的声音,发布党的命令,在革命战争时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星火燎原的土地革命到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从烽火硝烟的抗日战争到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再到众志成城的抗美援朝战争,红色电波保障了战场指挥通信,确保我军行动协同高效;开辟了隐蔽战场,加强对敌情报侦察对抗;建立舆论宣传窗口,扩大我党我军政治影响。为了让更多读者了解我军通信兵和无线电事业建设发展历史,本版从今日起推出“永不消逝的红色电波”系列稿件,敬请关注。

红军创建首支无线电队伍前后

■程宇一 曹明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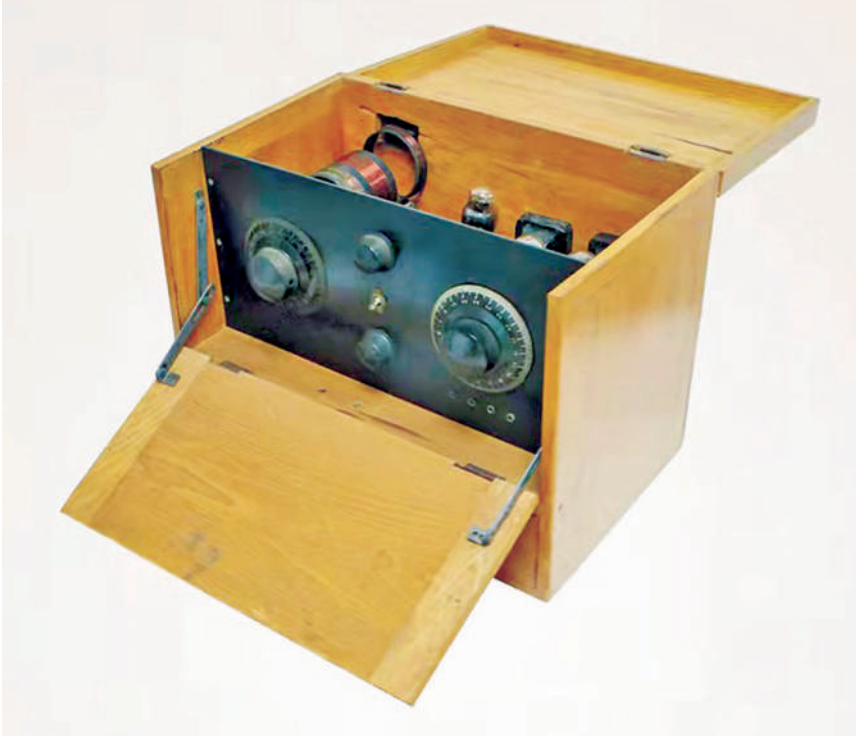
1931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通信队在中央苏区组建。此后,红军利用战场缴获、办班培训、实时运用等方式,克服电台装备短缺、通信人才匮乏、运用经验不足的困难,发展壮大了我党我军无线电通信事业,为中央制定决策部署、部队灵活快速行动提供了有效的情报和通信保障,对突破敌人军事封锁,赢得战争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半部电台”奠根基

在组织“围剿”红军行动时,国民党已拥有长波电台,并使用摩尔斯电码发报,而红军还主要依靠骑马、传令兵、哨音、军号声等运动通信和简易信号通信。毛泽东曾感慨,“没有无线电通信,部队联络不通,严重影响了作战指挥”。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调集10万余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大规模“围剿”。12月底,敌第18师两个旅深入苏区腹地龙冈。战斗中,红军趁敌立足未稳,抓住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一举歼敌,活捉师长张辉瓒,并缴获其使用的1部弹簧式灯座的15瓦无线电台,电台的收报机和充电机完好,但发报机损坏,无法进行正常通信联络。电台的报务员王诤、吴如生、韦文官、刘寅和机务员刘盛炳等人,经过动员自愿参加红军,成为红军第一批报务人员。3天后,红军在东韶战斗中歼灭敌军第50师,缴获了1部完整无损的15瓦无线电台。1931年1月3日,毛泽东和朱德亲切接见王诤等人,并授命王诤着手组建红军第一个无线电班组。朱德指着缴获的电台说,“无论大小武器装备,凡是白军有的,红军也会有,没有的,敌人会给我们‘送’来。”

1931年1月6日,红军总参谋处的东屋被布置成“报房”,王诤等人对这一部半电台进行第一次安装调试机。此时,这一部半电台还不能建立无线电通信,只能用来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电讯。经过调试,电台接收到第一束飞驰的电波。毛泽东第一次看到电台送来的电讯新闻后称赞:“这是没有纸的报纸啊!”此后,红军开始利用这部电台捕捉敌军电台信号,了解敌人动向,为红军把握战机、正确决策、出奇制胜提供了有力保障。

1931年1月中旬,红军在江西宁都小布镇组建了第一个无线电队,王诤为队长,冯文彬为政委。后来,中共中央



1930年12月,红军缴获国民党军的“半部电台”。

又派伍云甫、曾三、涂作潮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加强了无线电队的力量。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同志对无线电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朱德几乎每天晚饭后都要去电台询问,有没有什么新闻。毛泽东也非常看重无线电通信,在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红一方面军从闽西向赣南的兴国地区集结,为突破敌人包围圈,需利用夜色从两股敌人之间相距约20公里的缝隙中跳出去。行动开始后,各级指挥员和政工干部深入连队,要求严格做好行动的保密工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在夜色中还有一个可能暴露红军行踪的漏洞——电台的无线电信号。他马上找来电台人员询问,得知缺少电键,电台就不能工作。于是他派人收集来电键交给警卫员并交代:不到目的地,不许任何人拿走电键!

针对以前在国民党军工作的技术人员,毛泽东多次指示,要做好电台人员团结工作,政治上要信任,甚至亲自指定王诤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对于无线电技术人员的业务管理和生活安排,即使当时红军经费紧张、给养匮乏,无线电人员每月津贴相比普通战士也只多不少,还优先配备了运输马匹。在红军领导人的关心下,无线电通信队伍逐步壮大。

白手起家育人才

红军无线电队成立后,主要依靠留用原国民党军的技术人员。红军总部意识到,要充分发挥无线电台作用,迫切需要无线电技术人员。1931年1月28日,毛泽东、朱德联名签发《选调学生学无线电的命令》,在江西宁都组织第一期无线电培训。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经常抽出时间给训练班作形势报告、上政治课,毛泽东鼓励大家尽早建立空中桥梁,把被分割的苏区用无线电波连接起来,朱德则勉励大家在建设红军无线电通信事业中要不怕困难。当时,训练班教学条件非常简陋,学员们把树荫当课堂,石板当桌子,用左手大拇指当作电键来练习,铅笔用到手指捏不住了,还套上小竹管继续使用。4个月里,王诤为学员们教授报务和机务,还用木块、铁片制作电键,用旧铜线制造电码训练器等训练器材,供17名学员练习,培养了第一批无线电通信人员。

当时,由于国民党对中央苏区严密封锁,生产通信器材物质条件困难,王诤发动大家就地取材,把铜钱熔炼成薄铜板用来加工制作电器元件,将羊角研成粉末压制成胶木件代用品。在无线电队伍官兵的不懈努力下,红军最终组成了

中共中央无线电通信网。

此后,训练队扩建为红军通信学校,直到长征前夕,共举办无线电训练班11期,先后培训报务、机务、电话、司号、旗语等各类通信人员2100余人,对以后的中国革命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反“围剿”中露头角

在复杂激烈的反“围剿”斗争中,王诤提出可以用收报机侦收敌电来获取情报。他让通信班天黑后把天线架在山顶,提升通信效果,天亮前撤回以免暴露。当时国民党军译电机关和指挥官还没意识到无线电保密的重要性,每次电台开始联络时,就先明语问对方在何处、谁在主要方向,王诤和无线电通信队成员就不分昼夜地监听、捕捉敌军电台有用信息。王诤熟悉国民党军队电台呼号和电台报务人员发报手法,因而能从收报机信号中判断发报人姓名,进而判定敌军到达时间、地点、番号、分布和行动意图,掌握敌人的行动方向、退却路线、到达位置、指挥命令等信息,为红军总部领导制定战略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红军依托这些重要信息集中兵力,从敌人力量相对薄弱部实行突破,直接促成了第二、三次反“围剿”作战的伟大胜利。

红军捷报频频传来,毛泽东在苏区军民集会中高兴地说,“我们工农红军也有了千里眼、顺风耳”。1931年5月,红军在第二次反“围剿”战斗中,缴获了国民党军公乘藩部的一部功率为100瓦的电台。无线电技术人员通过这部电台,与上海中共中央取得了通信联络。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村开幕。在会场不远处的几间土房内,王诤、刘寅等红军电台的技术人员,通过之前缴获的那部100瓦的无线电台进行文字广播。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的消息,很快化作空中电波传向远方。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创建的最早对外播发新闻的通讯社“红色中华通讯社”(即新华社前身),由此宣告成立。我党第一次通过无线电台越过了敌人的“铜墙铁壁”,向全国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和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喜悦,向全国人民传播了胜利的佳音。

永不消逝的红色电波①

滑雪运动的“军事基因”

■周阿江



穿着雪地迷彩斗篷的芬兰滑雪部队,身后放置着越野滑雪器材。

在刚刚结束的2022北京冬奥会上,中国代表团获得9枚金牌,其中5枚来自滑雪项目。滑雪作为一项古老的运动,再次点燃了大众的运动激情。仔细探寻滑雪运动的发展历史,我们还可发现其中蕴含的“军事基因”。

国内外大量考古资料显示,滑雪运动起源于原始狩猎活动。如果仔细梳理滑雪运动的发展过程,能在纯净洁白的雪道上隐隐嗅到“火药味”。

滑雪无声无息,行动快捷,可以很好地满足军队在冬季严寒时期快速行动、

发动突袭等需要。于是,战争实践将“军事基因”牢牢固化在滑雪运动中。

13世纪奥斯陆战争期间,挪威军队已经开始用桦木滑雪板长途行军,其侦察兵借助滑雪来侦察瑞典人的行动。1204年,挪威滑雪部队利用移动速度快和适应环境的优势,在佩特萨摩击败了人数远超己方的丹麦军队。这是第一次有记载的滑雪部队参加战斗,“雪上轻骑兵”成为军队的新兵种。从14世纪起,滑雪被广泛用于芬兰、挪威、波兰、俄国和瑞典的战争。1719年,挪威成立了具

有近代意义的滑雪部队,滑雪部队也由此成为各国军事建设的一项内容。1872年,意大利建立一支特种山地作战部队,该部队作为王牌部队编制,一直保持到了今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德国、奥地利都成立了高山滑雪部队。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苏芬边界之争中,芬兰组建滑雪巡逻队来对抗苏军,受到重创的苏军将步兵师中会滑雪的士兵全部调出组成临时滑雪部队,才挽救败势。1945年,美国第10山地师滑雪部队与纳粹粹德国军队在意大利的山脉交战,赢得战争胜利。

滑雪运动的“军事基因”在今天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滑雪运动看似简单,其实对四肢力量、爆发力和协调性等都有极高的要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俄罗斯、韩国、瑞典、挪威的特种部队都将滑雪作为军队冬季训练的必修科目。美国更是提出:“在冬天受训的士兵在夏天也是个战士,而仅在夏天受训的士兵到了冬天是无助的。”我军针对东北、新疆等地区的地域特点和任务实际,将冰雪训练广泛融入日常训练之中,让官兵们在轻松愉悦、活泼紧张的运动中解锁打仗新技能,促进严寒条件下作战能力提升。

来源于枪林弹雨中的“军事基因”是推动滑雪运动优化和发展的重要“显性基因”之一。从俄国画家谢尔盖·伊万诺夫的画作《莫斯科之战》中可以看出,滑雪板在17世纪作为军事装备已经广泛

运用于战争中,并且外形已经相当接近现代滑雪板。1806年,瑞典军官发明了现代意义的滑雪杖,雪板也被分为适合不同用途的滑行板(较长)和攀登板(较短)。1910年,奥地利的乔治·比尔格里上校开设了军事高山滑雪学校,发明了制动转弯滑法和滑雪板的钢制安全固定器,推动了高山滑雪项目的发展。

时至今日,奥运赛场上依然活跃着那些带有强烈“军事基因”的滑雪项目。

越野滑雪,又称为北欧滑雪,是世界运动史上最古老的运动项目之一,其起源可以追溯到挪威侦察兵。挪威至今每年还会举行一次越野马拉松滑雪赛,距离35英里,与当年侦察兵所滑路程相同。

冬季两项。1767年,守卫在挪威与瑞典边界的挪威边防军巡逻队,曾举办第一次滑雪和射击比赛。规定滑完全程,并在滑行途中用步枪射击40至50步远的靶标,成绩最优者可得价值相当于20克朗的奖品。冬季两项比赛由此诞生。

跳台滑雪。1809年,挪威军队副官奥拉夫·赖伊为了向士兵展示自己的勇气,利用滑雪将自己射向空中,成为第一个为人所知的跳台滑雪者。

滑雪运动的“军事基因”,带着人类对共同命运的憧憬,正逐渐远离战争,而它与“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奥运精神的共鸣,也为洁白的赛道增加了更多的欢笑、激励和奋进,引领着人类飞驰滑向更加和谐的未来。

明清兵学

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明朝已经风雨飘摇。在上一年中,九边精锐尽丧辽东,明朝在关外的领土只剩下山海关、宁远等地;关内的农民起义军已经席卷明朝腹地,包围中原重镇开封。一时间关中危急,京师震动。无将可用的崇祯皇帝被迫启用获罪3年的孙传庭赶赴陕西前线,试图阻挡起义军进攻步伐,挽救明朝颓势,潼关之战由此爆发。

首挫敌锋

李自成等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摧枯拉朽般的进攻,令明朝惊慌失措。孙传庭于4月赴西安到任后,慌忙着手进行应对:先是处决了不服从指挥的总兵贺人龙,起用起义军降将高杰为总兵;加紧屯田募兵,筹措军饷,以待时机成熟后再与起义军作战。但崇祯皇帝急于稳定中原局势,一再催促孙传庭出兵。孙传庭只得于当年9月率军向河南进发。

10月,起义军同明军在郟县遭遇。先击退明军先锋牛成虎部,后遭到明军伏击,损失千余人,李自成令起义军撤出战斗。明军随后争相抢夺起义军丢弃的物资,开始陷入混乱。李自成等率起义军回师反击,在罗汝才等部支援下大败明军。孙传庭率军经巩县败逃回陕西,一路士卒缺粮,只能采青柿充饥。

起义军挟胜利之威一路高歌猛进,先后又在汝宁(今河南省汝南县)、襄阳等地取得大胜,逐渐控制了黄河以南和湖广大部分地区。李自成册官封号、分置郡县、改革军制,准备向关中进发,大有一举而定天下之势。

再破明军

面对起义军浩大的声势,孙传庭在关中抓紧时间备战,企图扭转颓势。一方面,大肆招募乡勇、补充军队;另一方面,抓紧打造兵器,赶制装载铳炮、甲仗的“火车”3万辆,以对付起义军中最势不可挡的骑兵。尚未准备完毕,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6月,明朝升孙传庭为兵部尚书,再次令其出战。孙传庭只得整顿军马,于8月督总兵高杰、白广恩、牛成虎等,率10万部众向洛阳、汝州等地进发。

起义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明军则趁机收复洧池、洛阳、龙门、汝州等地。9月,在起义军叛将李养纯的引导下,孙传庭又攻破宝丰和唐县,将起义军任命的大小官吏和将士眷属尽数斩杀。此次进军看似顺利,但困扰明军的补给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孙传庭本以为郟县屯有大批粮草,花费巨大代价将其攻克后,却仅仅得到骡、羊200只,于大军补给仅是杯水车薪。此时,粮道已被起义军刘宗敏部切断,明军士卒不堪饥饿,开始出现哗变逃跑现象。孙传庭不得已只得留河南总兵陈永福守卫郟县,自己与白广恩、高杰等分路前往关中迎粮。大军开拔后,郟县留守部队认为已被主力遗弃,也跟着撤退,陈永福无法制止。李自成趁机命骑兵发起追击,明军一路败退到南阳才稳住阵脚,双方随即爆发大战。陷入绝境的明军孤注一掷,接连冲破起义军三重战阵,与第四阵的精锐骑兵僵持不下,起义军遂集中兵力攻击白广恩部的“火车”部队。火车营由于训练不足,尚不熟悉战阵,在猛攻之下招架不住,随后波及骑兵,引发连锁反应,以至于全军崩溃。起义军穷追400余里,歼明军4万多人,孙传庭率

残部奔入潼关。10月初,起义军攻破潼关,孙传庭战死。

战法评析

作为明军主帅,孙传庭曾多次击退起义军。但孙传庭久疏战阵,对起义军战斗力的判断还停留在过去,未能客观清醒地估计战场形势。他对明军衰弱的战斗力也缺乏清醒的认识,可谓“不知彼不知己”,已埋下了失败的隐患。在赴任前,孙传庭向崇祯皇帝保证“五千精兵足矣”,空自抬高了统治者的预期,使得后续战略方针的实施陷入被动。经过辽东战场的抽调和历次清剿起义军战争的消耗,陕西明军数量和战斗力都已大大衰减,堪战兵马不到3万,其余皆为新募之卒。火车营尚未练就就被迫投入战斗,原本用以克敌制胜的王牌反而成为弱点。整个战役期间,明军饱受粮草不足的困扰,严重制约了孙传庭的战术和指挥。在执行层面,因此时明朝的组织调度几近崩溃,拥兵自重的湖广左良玉部不听调遣,使战前明军南北对进的计划落空。唯一协助作战的陈永福部,最后也因粮尽不愿担任断后任务,从而加剧了明军的溃败之势。

此时的农民起义军经过多年战火淬炼,李自成等起义军首领对战争的筹划和驾驭能力已有了很大提升。特别是在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夏、秋季的整顿后,起义军已成长为一支编制齐整、军纪严明、组织有度的劲旅。在后勤保障方面,起义军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不仅兵士供给充分,马匹也能得到悉心照顾,同明军乏粮的境遇形成鲜明对比。在战术使用上,作为起义军首领的李自成坚持避免空虚,各个击破。在部分明军主力仍有一战之力的情况下,抓住其补给乏力这个弱点,主动避其锋芒,拉长明军的补给线,在其组织混乱时再行发起战斗,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南阳的战斗中,由于明军作困兽之斗,形势一度对起义军不利,但李自成临危不乱,果断调整攻击重点,最终抓住白广恩部的火车营取得突破,为整场战役的获胜奠定了基础。

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起,孙传庭出潼关同起义军发生的一系列交锋,是明朝孤注一掷的主动进攻,这一尝试以关中失守,起义军获得全胜而告终。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



潼关古城,位于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北。